



An Outline of Psychoculturology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e civilizations

# 心理文化学要义

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尚会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心理文化学要义

-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尚会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尚会鹏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 - 7 - 301 - 21558 - 6

I. ①心… II. ①尚… III. ①心理学 - 文化学 - 研究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4061号 B. 1083

书 名: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著作责任者:尚会鹏 著

责任编辑:胡利国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21558 - 6/C · 085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1印张 333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

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卢梭

## 序言：二十二年的“要义”

1990年初,当时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袁方教授(1918—2000)邀我为社会学系讲授比较文化方面的课,我爽快地答应了。现在想来,当时年轻气盛,胆子大,没有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1990年4月23日,我将编写好的教材《比较文化模式》交给社会学系的打字室打印。因为时间紧,没有校对时间,教材十分粗糙。当时使用的是铅字打字机,字迹模糊,错误很多,这就是本书的前身。后来,我以这门课为基础,在北大开设了针对全校本科生的通选课,即现在的“心理行为与文化”。这样算来,这门课已讲了22年。由于讲义牵涉的问题太多,极难把握,尽管一改再改,我总不敢拿来出版。当课堂上学生问我有没有教材时,“正在编写中”这句话我说了二十多年。由于没有教材,课堂上总是灌输多,讨论少,这始终是我这个授课教师的一个心病。前年,我终于下决心将讲义定型出版。经过一年多的修订整理,今天终于以《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之名出版。看着从出版社拿回的该书的二校稿,再翻看22年前那纸张已泛黄的讲义,我为多年的讲义能集结成书而欣慰,为自己的慵懒磨蹭造成课堂上学生的不便而歉疚,也为岁月的沧桑而感慨。现在,我终于可以向可爱的学生们说:“讲义印出来了!”“这一讲安排先阅读教材,然后讨论!”

22年占了我学术生涯的大部。这期间,我一边授课,一边在研究中使用着授课中阐述的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所以我也把这部《心理文化学要义》看作是我二十多年学术人生的简要总结。

这二十多年,世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觉得有两件事,比较大地影响了这门课和这本书,也支撑着我坚持不懈地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一件事是冷战后出现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因特网等通讯设施的发达,使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密集,把世界连成了一座。有乐观的学者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看法,也有人说“世界在变平”。我常问自己:在人们都在讨论世界要变平的今天,我仍这样执著地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是不是不

合时宜？我思考的结论是否定的。冷战结束后，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论点，旨在告诫人们（尤其是西方）不要盲目乐观，今后的世界，以文明为分界线的冲突将加剧。他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但不幸的是，冷战后世界上频发的宗教、民族冲突和恐怖活动，似乎在应验着亨廷顿的预言。我们看到，在世界出现一体化趋势的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个相反的趋势，即人们寻求文化认同、强调自己民族和宗教特色的趋势。仔细想来，这两个趋势并存是必然的，这背后是人们文化认同的焦虑。社会变化越剧烈，人们越需要寻求自己安身立命之所，趋同的趋势越是猛烈，人们就越是求异，越需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当人们喝的是可口可乐、穿的是牛仔服、看的是好莱坞大片时，自然会疑惑：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会不会变成美国人？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变成美国社会？幸运的是，我们身在其中的文化，并不都是变化那么快，文化的内核是很难改变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仍同我们的父母辈、乃至祖父母辈有一定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就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不会变成美国人或其他族群的原因所在。我相信这种探索文化差异性的工作没有过时。心理文化学的前身是国民性研究，一定意义上说，国民性研究就是一门回答“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学问。心理文化学作为升级版本的国民性研究，能够为当今世界寻求身份认同提供帮助——这个信念一直鼓励着我坚持这方面的探索。

另一件事是生物学界对人的基因组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我不太懂生物学上的东西，但我一直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关注这方面的进展：“科学家发现母亲育儿方式可能通过基因遗传”、“振奋不已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发现了掌管语言的基因”、“女性直觉可以用基因来解释”、“德国科学家发现了控制胆固醇的基因”等报道，常使我激动不已。十年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不久前又完成了千人基因组测序，绘制了据说最详尽、覆盖率达到人类的95%基因组遗传多态性图谱。至少从理论上说，今后科学家能够快速锁定任何与疾病相关的变异基因，从而准确地制定出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新策略和新方法。我在为生物科学取得的巨大进展而兴奋的同时，也为社会科学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进展缓慢而沮丧。人的基因隐藏着我们个体遗传的密码，黄种人不同于白种人的身高、体形、肤色、眼睛等是由基因决定的，儿子与父母在身体、性格以及行为方式上的一致性，也有基因基础。由此我想到，我们人类的文化延续性，是否也有类似某种生物基因的东西支

配呢？我们的价值观、审美观、情感模式、人际关系模式以及行为方式等，是有“遗传性”的，这些东西一代代传下来并传下去。这种延续性给我们生活以稳定感，使我们减少了许多选择的麻烦和焦虑。这种不变的、在背后支配我们行为的“密码”，不是十分类似某种生物“基因”吗？当然，这种“基因”不是存在于人的细胞中，而是存在于文化之中，人类的行为恐怕最终还得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我甚至有时把心理文化学对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的比较研究，比做生物学对人的基因组的测序。这样做比或有不妥，但我相信有一定的道理。这种信念是支撑我坚持进行这方面思考的另一个动力来源。

我出身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受教育条件差，后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教育受影响。文化知识底子薄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身上的软肋。当时的初中和高中，不怎么抓学习，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考试，学与不学基本全凭学生自己。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凭自己的兴趣读了一些书，勉强弥补一些学校教育的不足。但现在想来，自己也有所得：可能正是这种不为考试，不为拿学分、拿学位，而是基于兴趣的学习经历，使我一直保持了对学术研究的强烈兴趣。我对眼下盛行的那种“拼凑一帮人、申请一个项目、花掉一笔经费、搞出一个拼盘、应付一次评审”的科研做法很反感，认为这违背了学术研究高度个性化和独创性的要求。我坚信兴趣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动力和精髓。我不敢说我的学问做得好，但我敢说我的学术活动都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或为了完成某个项目所为，而是基于兴趣的探索。正是在这种不受学科限制、不为“项目”、“经费”所累的自由探索中，我接触到了美籍华人许烺光的心理人类学理论，认为这门学问的视角和方法很适合我，我便将自己的学术定位于该学派。我花很大力量对许氏的学说进行梳理，厘清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若干新的概念对他的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我将他的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这一部分单独列出，命名为“心理文化学”。所有这些努力都体现在这门课和这部教材中。本书虽是作为教材出版，但它绝非拼凑之作，它是我对心理文化学这门学科的全面整理，凝结着我在这方面常年思考的结晶，因此，说它是我学术生涯的“要义”一点也不为过。

所谓“要义”，乃是讲义的要点，它是将原讲稿删繁就简后的结果。原讲义中有大量的事例分析，集结出版时都删除了。但这样做的结果，也有一些弊端：有的章节显得过于简单，只有理论概括而缺乏实例支撑，我希望读者

在读到这样的地方时,想一下本书的题目和它的授课背景,把这些地方当作是作者(讲授者)提出的问题要点,进一步思考和验证工作留给读者来做。当然,我期待有一天能出版一部更丰富、遗憾更少的《心理文化学详论》。

在书稿交出版社前,厦门华侨大学的游国龙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的张建立博士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胡利国先生是该书的责任编辑,他认真审阅了书稿,发现了诸多错误,这促使我又对原稿进行了一遍仔细的检查。感谢他的认真作风和敬业精神。

看到努力多年的心血终于出版成书,作者自然有一种收获的喜悦,这是一种非文字工作者难以了解的体验。但书一旦正式出版,便成为公器,所有错误和缺点便推到众人面前,白纸黑字,作者再无修改、隐藏、辩解的余地。在尚未见到成书之时,作者已经做好了接受批评、在将来再版时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准备。

尚会鹏

2012年9月24日于白求村



# 目 录

<b>第一章 心理文化学:源流、视角与方法</b> .....	(1)
一、心理文化学源流 .....	(1)
二、心理文化学的文化视角 .....	(14)
三、心理文化学的心理视角 .....	(24)
四、心理文化学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	(29)
<b>第二章 人的各种需要及其满足</b> .....	(33)
一、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 .....	(33)
二、需要的种类 .....	(35)
三、情感需要 .....	(37)
四、需要的三个类别、三个层次 .....	(42)
五、文化与需要的满足 .....	(48)
<b>第三章 整体人模型:“心理社会均衡”理论与“基本人际状态”</b> .....	(53)
一、理论与假设 .....	(53)
二、个案考察 .....	(71)
<b>第四章 集团维度( I ):亲属集团</b> .....	(84)
一、理论与假设 .....	(84)
二、个案考察 .....	(97)
附录 几种亲属类型与行为 .....	(116)
<b>第五章 集团维度( II ):主要次级集团</b> .....	(122)
一、理论与假设 .....	(122)
二、个案考察 .....	(129)

<b>第六章 交换维度:人与人关系模式</b> .....	(155)
一、理论与假设 .....	(155)
二、个案考察 .....	(169)
<b>第七章 情感维度: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b> .....	(185)
一、理论与假设 .....	(185)
二、个案考察 .....	(201)
<b>第八章 自我认知维度:基本人际状态的内形象</b> .....	(230)
一、理论与假设 .....	(230)
二、个案考察 .....	(245)
<b>第九章 心理文化取向:心理社会均衡的引导力</b> .....	(265)
一、理论与假设 .....	(265)
二、个案考察 .....	(274)
<b>附录 1 几个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比较</b> .....	(297)
<b>附录 2 心理文化学重要词汇索引及简释</b> .....	(305)
<b>重要参考书目</b> .....	(324)

# 第一章 心理文化学:源流、视角与方法

## 一、心理文化学源流

心理文化学(psycho-culturology)是从文化和心理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人的学问。作为一个学科,它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 (一) 文化与人格学派

“文化”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人格”属于心理学范畴,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是从文化和心理相结合的视角把握人的。该学派被认为是人类学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产生的一个分支,是现代心理人类学的前身和心理文化学的源头。

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类学界受到奥地利精神分析学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图腾与禁忌》一书的极大影响。1920年,美国学者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门下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 1876—1960),在美国人类学会刊(*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为此书撰写的书评,可视为心理分析派对人类学产生影响的开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与人格”领域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人类的发展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熟过程还是文化学习过程这一问题展开的。当时许多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种族的发展是从原始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单程进化,这是种族生物遗传特征的变化而导致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的提高,就像个体的生理发育过程一样。显然,在这里,文化的作用被忽略,个体的人格源于生物本能,文化不过是生物本能寻求满足的副产品。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达尔文的表兄弟)认为“野蛮”与“文明”社

会的全部差异皆可用“不同种族的固有特征”加以解释,先天因素绝对压倒后天因素,人类的发展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与社会文化无关。他们嘲笑非洲黑人的愚蠢,高尔顿甚至提出了改进遗传之法以提高种族品质,认为用改良牛马品种 1/20 的费用和辛劳就可以培育出大群的天才人物。

以博厄斯为首的另一派则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批评生物决定论者的观点,强调文化对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以印第安人为例,由于白人文化的入侵,印度安人的部落生活解体,故而导致了他们的后代在心理上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博厄斯认为,人类之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行为模式非由其生物特性决定,而是由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所决定。博厄斯学派通过对弗洛伊德的批判研究,去除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与生物决定论,强调文化对人格的决定作用。从此,文化决定论便具体化为文化决定人格论。博厄斯学派认为,通过对文化决定人格的研究,可以解释不同的社会行为模式,使文化与社会行为真正结合起来。为此,他们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博厄斯的两位女弟子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收集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为文化决定论提供了证据。

当时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人在青春期身心处于不平衡状态,会受到此前没有过的冲动与驱使。而博厄斯却认为,这是文化决定的。1925年他派学生米德去太平洋岛屿萨摩亚进行田野调查,1918年米德写成《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 1928)<sup>①</sup>一书出版,此书证实了青春期的不安是文化造成的,并对男女特有的气质差异问题提出了疑问。这部著作受到博厄斯的高度评价。

对西方人来说,青春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危险期。青少年迅速进入性成熟期,可心理承受力相对较弱,面对不同的角色转换和各方面的压力,易于冲动和反叛,对权威充满怀疑。米德通过调查发现,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并未出现上述特点,相反,那里的女孩度过的是一个毫无生活情趣、安静而无骚动的青春期。由于没有父母的约束,没有性的困惑,丝毫没有西方社会所见到的那种紧张、抗争和过失。在萨摩亚人的社会中,青春期本身没有被社会所重视,社会的态度或期待也没有发生变化。青春期不仅未经任何仪式

---

<sup>①</sup> 中文译本著作有:M.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等,周晓虹、宋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而在文化上被忽视了,而且在孩子的情感生活中也毫无重要性可言。因此米德指出,青春期只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事实,可由文化的差异给出不同的定义。

米德还通过对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了性别与气质同样是文化的产物。在此之前,关于性别角色及其差异的最流行观点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认为,男女不同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是由不同的生理解剖特征决定的。但米德在调查了新几内亚的三个原始部落后发现,那里的性别差异与西方社会不同。阿拉佩什人无论男女都十分顺从,攻击性极低。蒙杜古马人的男女则都冷酷残忍,带有强烈的攻击性。德昌布利人的男女角色恰恰相反,女人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男子很少有责任心,多愁善感,依赖性极强。米德的研究证明了文化对人格的塑造作用。她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中写道:“人类的天性是那样地柔顺,那样地具有可塑性,可以精确地,并有差别地应答周围多变的文化环境刺激。……我们说性别之间的标准化了的人格差异也是由文化‘监制’的。每一代男性和女性都要在文化机制的作用下,适应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sup>①</sup>

在这个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学术界内外对性别与气质、育儿方式和人格的关心也普遍高涨。“米德所举的双胞胎例子很有说服力。如果将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个放到出生地法国、而将另一个放在德国养育,长大后他们会讲不同的语言和有不同的期望,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不同。这些差异也会反映到他们的深层,如对饮食习惯的爱好,对某党派、某政府的态度等,尽管他们有相同的遗传性,但其性格却不同。如果把双胞胎中的一个放在爱斯基摩人中养育,他长大以后,不仅语言、风俗习惯是爱斯基摩人的,也会期望娶一位爱斯基摩姑娘做新娘。”<sup>②</sup>

执著地探索文化与人格关系并为该领域做出贡献的还有露丝·本尼迪

① M. 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267页。

② 周大鸣、乔晓勤编著:《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但学者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对马格利特·米德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作者声称在40年的时间里先后6次深入萨摩亚,经过大量细致的调查之后完成了震惊文化人类学界的《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学术著作。该书从方法论和理论上批驳了米德,得出了与她完全不同的结论。《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原版:Derek Freeman, *Margaret Mead & Samoa*, 1984, 副标题:“人类学深化的形成与破灭”。

克特。她也是博厄斯的学生,其博士论文为《北美的守护灵观念》(1923)。她于1934年发表《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该书是集合先前发表的几篇论文,再加上对普韦布洛人、多布人和克瓦基特人三个北美印第安原始社会描述而成。她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文化决定的,个人与社会并不是弗洛伊德宣称的那样水火不容,个体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被塑造成具有特定文化性质的存在物。每一种文化不过是所有文化中的一小节,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殊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其他文化看来可能是荒谬的或怪诞的。“文化模式”是指一个民族的各部分文化内容之间彼此交错联系而形成的一种系统的文化结构。“一种文化犹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sup>①</sup>她引入尼采研究希腊悲剧时使用过的“太阳神型”和“酒神型”的概念,来描述普韦布洛人、克瓦基特人和多布人的人格。她认为人的大部分行为是由文化决定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行为中可能的形式都有某些限定的部分被当做积极因素受到鼓励,其他部分则受到抑制。个人在某一个别文化里生活成长的过程中,接受自己文化中“优秀的”、正在得以助长的部分。例如,在具有以中庸为生活准则的太阳神型文化中,富于竞争的人格不受欢迎,从而使人们举止谨慎。而在新几内亚东部的多布人社会,存在许多助长怨恨和敌意的制度,人们在表面的友情和协作背后,隐藏着背叛、对不属自己谱系的人严加戒备以及充满猜疑心的偏执性格。本尼迪克特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社会中的价值标准是不同的。同性恋、强奸、色情狂在某一种文化中是被禁止的,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是合理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正常与异常行为的判断标准显然是不同的。本尼迪克特明确地把文化与人格的研究结合起来了。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被米德描述为“二十世纪第二个25年最伟大的书籍之一”。她的研究不仅仅限于简单社会,她对日本这个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整体把握,集中在1946发表的《菊花与刀:日本文化模式》(*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一书中。这部著作成为人类

① R.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学的名著,至今仍影响很大。但她的观点也受到许多批判。美洲印第安人应当包括各种不同的文化,她将这些文化简单归为几个“型”,似乎太草率了。学者批评她为了指出美洲印度安人的酒神型倾向,支离破碎地选取了一些文化特征,将其拼凑起来。同时,怎样理解太阳神型与酒神型这两个极端以外的文化类型也是一个问题。学者们还批评她没有在社会文化体系与人格体系概念之间进行明确的界定。她依据心理分析概念,把精神病学学术语应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和文化整体,把不同民族的文化看成是所谓每个民族共同体固有的特殊的精神病理学表现,照现代学科水平看来,这种轻率的见解简直不可思议。对本氏观点的批评许多是有道理的,但也有的站不住脚。比如批评她将文化过于整体化、抽象化、冻结了历史变化和阶层差异,以及批评她没有到过日本而仅仅根据访谈在美日本人就下结论等,就没有什么道理。须知她采用的是文化人类学视角,这个视角要求她冻结诸如历史变化等要素。专业的训练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理解能力完全能使她在看似不关联的材料之间指出关联性,即便不去日本(当时客观条件不允许)也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她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民族的特点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

## (二) 哥伦比亚讲座派

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类学开始较多地导入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方法。林顿(Ralph Linton, 1893—1953)作为博厄斯的继任,1937年从威斯康星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与纽约精神分析学研究所的阿伯兰·卡迪纳(Abram Kardiner, 1891—1981)<sup>①</sup>、克拉克洪(Clyd Kay Maben Kluckhohn, 1905—1960)<sup>②</sup>开始共同研究,他们后来被称为“哥伦比亚讲座派”。该学派意识到了博厄斯学派在理论上的缺憾,尝试对其修正。他们提出了文化与人格交互作用的理论,不仅强调文化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而且重视人格在文化创造和变迁中的作用。林顿和克拉克洪对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作了进一步扩展。林顿将文化模式界定为“行为标准”,分为“实际文化模式”

<sup>①</sup> 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博士,1919年赴维也纳受弗洛伊德的指导。

<sup>②</sup> 美国人类学协会前主席,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著作有《纳瓦霍人的巫术》(Navaho Witchcraft);《人民的儿童》(1947),合著;《人的照鉴》(1949);《文化:一种述评》(1952),与A. L. 克罗伯合著;《人类学和经典著作》(1961)以及《自然、社会以及文化中个性》(1948)。

和“文化结构模式”。克拉克洪则将其分为“约束、理想或规定模式”和“行为模式”两种,前者是指行为标准,后者指实际行为。克罗伯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模式观点,与现今流行的文化模式理论颇为接近。他将文化模式分为四种类型:(1)普遍模式,即文化的不同部分具有所有文化的共同特色。(2)系统模式,即文化元素结合为一个系统或一个复合体。(3)全文化模式或基本模式,即一种文化据以存在的根本条件。(4)风格模式,指一种能意识到文化目标得以达成的方法或态度。他们与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尼迪克特注重某一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把文化看做是“大写的人格”,而哥伦比亚讲座派则指出,在同一文化中成长的人们存在着很大的个人差别。本尼迪克特和米德是从“文化如何影响个人”角度进行研究的,而林顿等人则相反:考察个人的心理结构如何投射于文化之上。该学派第一次以明确的方式系统地将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研究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研究了“制度”与“文化”的区别以及与人格的关系。林顿认为,任何社会成员都具有一系列共同的人格因素,此人格可称之为“基本人格类型”(Basis Personality Type)。此外,每个人在适应社会体系内特定位置的过程中,形成与一定的亚组织和阶层相适应的反应装置,就是说,对事物的理解方式、共有的价值、相似的情绪反应等使得亚组织具有一定的特征。在这种反应倾向的背后,夹带着一定的人格,他称之为“身份人格”(status personality)。<sup>①</sup>林顿将从属于文化类型的外部行为所唤起的个人内部反应称为“态度”(attitude),将导致这一反应的外部因素称为“价值”(value),并且认为这种“价值、态度体系”在每个人身上形成时赋予人以动机,使之采取一定的行动,于是它就形成了这一亚组织的基本人格类型。<sup>②</sup>该学派超越了文化决定论,不仅考虑了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反复论证的文化的的作用,还注意到了个体对文化的影响。

该学派提出的“基本人格”概念兼顾了文化与个体两者,一定程度上还把文化引入了个体内部来考察。林顿与卡丁纳都认为,童年期的经验对人格有着持久的作用,具有相同经验的个体倾向于发展相同的人格。基于此,

<sup>①</sup> 拉尔夫·林顿:《人格的文化背景——文化、社会与个体关系之研究》,于闽梅、陈学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2页。

<sup>②</sup> 克莱德·克鲁克洪等著:《文化与个人》,高佳、何红、何维凌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由于受共同的早期经验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共有的人格类型,即“基本人格类型”。基本人格类型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基本人格类型,但基本人格类型并不完全决定个体人格,它只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发展趋势和相同的投射系统,即基本价值与态度。基本人格类型仅仅是个体人格的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否则,一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将是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基本人格类型为个体人格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普遍的趋势,一种投射系统,个体正是在这种共同趋势的影响下,为了适应其在社会系统中的特定位置,形成了一种相同的理解事物的趋势,有相似的价值体系与情感反应。文化通过基本人格类型塑造并控制着建立在社会生活基础上的个体兴趣与活动,赋予它们特定的文化意义。林顿的整个思路在于,文化塑造了基本人格类型,并通过它来影响个体人格,但基本人格类型又不完全决定个体人格,文化是由个体人格表现出来,个体人格通过基本人格的投射系统,以不同方式影响文化。这样,文化与人格构成了交互作用的关系。此外,该学派对于“价值”、“制度”、“身份”、“角色”以及“文化模式”等问题的探讨做出了贡献。

但该学派也存在严重不足。首先,林顿和卡丁纳的理论受到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很大影响,在基本人格的形成上都过分重视幼年经验。他们认为,形成于童年早期的基本人格类型或结构成为个体日后潜意识的支配力量。正如卡丁纳所说,基本人格结构可以经由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投射出来。文化的影响虽被引入了个体的心理研究,但却是作为潜意识的存在,是被推断出来的,或是被抽象出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人的经验意识的现实。

### (三) 国民性研究

人们希望能像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一样了解一个族群的性格,因此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又称“民族性”)一直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题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对“民族性格”投以极大的兴趣。当时美国与轴心国家作战,必须思考自己的敌人日本人和德国人、自己的盟友俄国人以及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民族。为了更详尽地认识自己和对手,一些人类学家受邀参与了对本国国民、同盟国以及敌国国民性的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y)。一大批学者参加了这个研究计划,出版了一批有关日本人、德